

为文学而文学是一种切实的为文学

——印象三位宁夏文学女性

为文学而文学,为的不是人们向来比较警惕的“纯文学”,而是文学从培植、发芽、生长到发展,全过程中缺一不可的天然胸怀和状态。极端一点说,这种胸怀和状态,甚至不是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等可以后天规范、教育以及打造出来的,毋宁说它就是天生的文学人。

既然是天生的,实际生活中那就不会太多。相反的例子反倒俯拾即是,簇拥在我们自己的身前身后,一不小心就会踩个正着。比如,有人弄了一辈子文学,因为文学,也可谓油头肥脑,但一望呆滞上翻的眼神便可知,还是世俗功利的酱缸里滚得太久了,没法利索地直起腰来;有人以文学为名义,左冲右突,恨不能给文学磕头作揖,其笔下亦不乏谦谦君子,然一旦遭遇现实,被现实一检验,原来不过是一个扛着文学衣钵的江湖浪人,让此君单独一点行事比登天还难;有人喜欢躲在文学背后运筹帷幄,好为旗帜,然窥其一举手一投足,乃至一颦一笑,实在团团伙伙、狗苟蝇营、杀气腾腾,与文学所要求的气质隔着十万八千里。除此之外,另有一种比较隐蔽的文学人,是不容易一眼看穿的。他们常常很巧妙地把自己打扮得像文学那样玩世不恭,抑或把自己处理得跟文学一样嫉恶如仇,拍拍打打,口吐莲花,可是当文学突然碰到该与世俗较劲的时候,出溜一滑,人不见了。

见多了诸如此类文学人,不免心生畏惧,唯一的办法就是绕着走。

这个世界上既然有文学这个“无用之学”,就必然有那么几个真正为文学而生的人。她们不但懂得锦上添花,更明白雪中送炭;不但意会顺水人情的迫不得已,更清楚扶上马送一程方可见得革色新的紧要。我说的是几位普通的文学女性,尽管她们均已退休,然犹在岗位。若干年过去,回过头来再回忆这几位文学前辈,对比切身语境,竟大有恍若隔世之感。



阳光诗意图的哈若蕙

宁夏文坛的余光慧、冯剑华和哈若蕙,在岗时,她们都曾分管宁夏作协工作。冯剑华之后,哈若蕙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在宁夏文联分管宁夏作协工作,这也是我与她们多多少少有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哈老师既是教授、出版家,又是文艺批评家,她分管宁夏作协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在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当时的宁夏作协文学研讨会还是比较多的,我也被哈老师真诚邀约过好几次。虽然深知自己乃地地道道野狐禅,肚子里根本没有那么墨水,但每每见哈老师礼贤下士的真诚,有时把持不住难免会虚张声势胡说一通。哈老师却一直笑呵呵地,要么点头配合,示意继续说下去;要么作思考状,深表认同。如此这般,与哈老师算是最有私交的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哈老师、马星、赵炳鑫、许峰谈一则对话的事。

这则对话是我与赵炳鑫、许峰三人发起的关于“读不懂”现代性文学批评的对话,整理完成之后,刊发在2015年(记得不确切)宁夏文联主办的机关报纸《宁夏文艺家》某期上,备作那一年宁夏文联文学艺术院举办的青年创作培训班参考阅读之用。为什么是关于“读不懂”现代性文学批评的对话呢?这个话头有点长。简短地说,当时宁夏文学界私底下似乎涌动着一种思潮,认为文学批评,他们叫文学评论,不应该引入现代哲学乃至现代启蒙的概念和价值观。认为只要掌握了中国传统的一些观念——实则被他们简化成人云亦云、不知其踪的“天人合一”、真善美、诗意图情一类的东西,就够了。何须费尽周折、拐弯抹角搬用理性、启蒙、文化现代性呢?现在再看,此类观点和认知,当然相当幼稚了,甚至也可以肯定,持此观点和认知的人,基本不懂现代文学和现代理论是什么,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实践一篇现代批评了。

这是引发我们搞一次对话,以对话所特有的口语化廓清此观念的陈旧和荒谬之处的基本前提。出人意料的是,这则七千余字的对话投给《宁夏文艺家》后,却引起了兼任该报总编的哈若蕙的特别关注,她觉得这不妨是一次宁夏文学界新的启蒙运动。当然在她来说,前提是里面的问题意识、分析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必须是言之有物、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不能放空炮。

既然如此,便只能当面研究、琢磨,以便打磨得更完整更透彻。我记得从她关注到这则投稿到正式刊发,总共召集我们当面谈过三次。最后一次商讨,也邀请了个别创作者来参加,无非是想多听听创作一方的看法,尽可能求得观点稳妥。有作家的确发表了不同看法,大意是批评需陪伴创作成长,多鼓励、多呵护,多褒扬为主,原因是宁夏文学毕竟地域文化特点突出,在现代转型期还比较脆弱,传统农耕的惯性短期内难以摆脱。而且也认为正是传统乡村文化的底色,成就了现如今的宁夏文学,没什么可质疑的。

我们代表理论批评一方的自然是多听不同意见,尽可能吸纳作家意见,做到有的放矢,不便当面辩驳。这稿子最后当然还是哈老师拍板定,虽然她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批评一方,但拍板时她只要求我们在刊发前再仔细滤一遍文句用词,其他不用改,这其实就是她的态度。

由此可见,身为批评家和文学领导者,哈若蕙老师深知批评的真正功能和价值作用,那不是顺着作品做装潢和粉饰,装潢和粉饰也不是引领,而是提供不同的思维和观念,从学理上打消滑溜的惯性乃至惰性。总而言之,通过与哈老师的学术交流,感受最深切的,是什么才是文学真正的阳光和诗意图,并让这些品质渗入到文学的逻辑结构中去,实在不是用表面的阳光和诗意图遮住发霉的、潮湿的里子。这正像她致辞或讲话前经常惯用的开场白那样,“啊,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因为文学,我们有幸坐在一起……”或“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能坐在一起聊关于文学的事情……”这些话语,听多了似乎有点那个。但若要注意到整体语境的僵硬和暮气沉沉,其实这些话语里本来就含着个人的又是希望敞开来晒一晒的开放度,这非常重要的。有这样的话语方式鸣锣开道,整个研讨会必然弥漫着支持使阳光成为阳光,使诗意图成为诗意图的气氛。



干脆利落的冯剑华

在中国当代文坛,张贤亮大家肯定都知道。知道了张贤亮,冯剑华也就不难知晓了,他们是夫妻。

吾生也晚,张贤亮在岗时,未能当面拜访求教;直到张贤亮去世前一段时间,有人邀约去看,也因各种不必要的顾虑,亦未缘面一面,这实在太遗憾了。遗憾中的幸运是,文学活动之故,与张贤亮夫人冯剑华倒打过不少交道。当然,打交道也只是说在她领导下完成一定的任务罢了,根本没有私交。

记得也是大约2005年七八月份,时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宁夏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的冯老师,照样打电话到住宅座机,告知我拙著《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当时还不叫这名),拟推荐参评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这是她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兴奋之情,自不待言。没想到,这事在终审环节黄了,听说理由是我用牛刀宰鸡,意思是论评对象实在太小了,也太地域化了。于是按照相关意见,我差不多用大半年时间来充实、润色和补充,企图使其大起来、非地域化起来,以备来年再试。可到了来年,我电话请示冯老师,她果断地说,一直没听到你整理书稿的信息,以为你放弃了,今年我们决定推荐马金莲的小说集。她所说的今年是2006年。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为着宁夏文学工作,作为作协负责领导,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再地推荐一部不确定的作品。后来得知,马金莲的小说集也未获通过,这也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当年小马小荷才露尖尖角,一切还都才开始。拙著又进行了许多补充乃至重写,2007年是雷达先生以个人名义推荐并最终获得通过。其中的波折,自然也构成了某种颇有嚼头的故事,此是后事,无需在这里赘言。

冯老师第二次主动给我打电话,大概是2006年5月的某日。这次电话,实在让我震惊。接通后她基本上没有任何寒暄,开门见山,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调你到《朔方》编辑部,不知你有无这个想法。她可能听出了我一时无法作出肯定性回答的难堪,于是迂回了一下,说,给你一周的考虑时间,考虑好了给我电话,随即咔嚓挂了。离开教育岗位,是我冥冥当中欲求的事。至于离开后到哪里去,我还真相当茫然。因为这毕竟不是我有什么理想就能按理想来办的事,决策权不在我。现在想来,当年的年轻轻轻浮,遇事既呆板无知,又消极无礼。一周后,我仍在犹豫中,但没有按冯老师的约定给回话。这是我的根性,到目前为止,每到十字路口,后面若有人用力一推,也就必然做出决定了。否则,本来明朗的事总会让纠结纠缠,进而痛苦不堪也。不知如何取舍,直到陷入如此消极的情绪循环却不由我醒悟。冯老师不是这样的人,她不会勉强去为别人的犹豫不决埋单,更不会替别人做主。至于编辑部后来进了谁,是不是冯老师主力所调,我就不知道了。总之,编辑部的确进了新人,而且干得肯定比我好。现在,有时我还会回想,冯老师调我,与前一次未推荐我的拙著,有没有关系呢?这样的念头一产生,我马上就掐灭了,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无论主动推荐拙著,还是主动调我,主动权都在我,是我错失良机,与冯老师何干。

后来在一些文学活动现场自然也见过几次冯老师,表情有些冷淡,她显然生气了。当时我内心的实际情况是,我想上前给冯老师一个郑重而深刻的检讨。可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语境一天天变化,犹豫越加严重,这个需要当面的感谢、检讨和道歉,最终变成了我心底里的一个厚厚的结疤,死在那里了,像个顽疾根治不了却一触便痛。越是没勇气,便越是内疚;越是不直面,便越想回避。

自此以后,冯老师的干脆利落深深地教育了我,迄今为止,不知改变得怎么样,我自己很难准确评价自己。但对于合作者,能力大小是一回事,态度必须得让人感觉到舒服,成了我衡量行事做人的一个首要标准。推及到文学,如果余光慧老师的事无巨细、体贴入微,是文学的必需品质。那么,冯剑华老师的果断裁决、干脆利落,亦是文学价值的首要诉求,有了它,可以避免骑墙派的相对主义。

如果还能见到冯老师,我一定会勇敢地走上前,把冯老师的一个道歉、检讨和感谢,深深地说出来。



眼光向下的余光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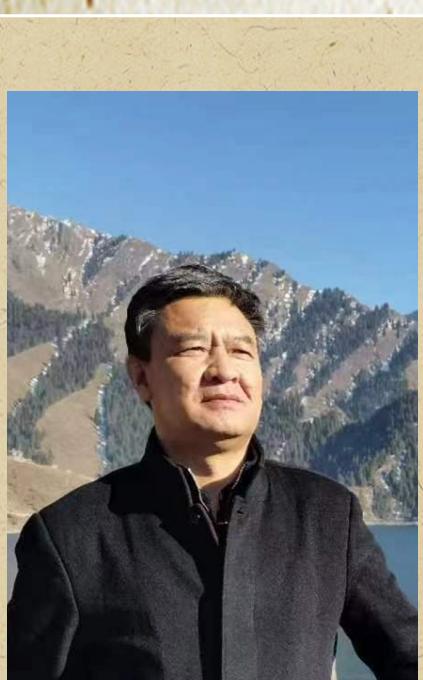
2005年之前,我辗转于最南端的西吉县和最北边的石嘴山市。教育对象虽在不断变化,可三尺讲台却是固定舞台,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到底要干嘛,心里实在没个底。一会儿涂鸦点叫散文随笔的东西,一会儿又倒腾些书评之类的玩意儿。总之,从教10多年,教育教学似乎一直是一个副业,这种危险的信号,也着实吓我一跳。忽忽悠悠,直到2000年还是2001年,无意中读到《散文选刊》上选载的一个人的好几篇散文,一下子吸引了我。那个作者就是当时散文界疯狂拔尖抽穗的刘亮程,其散文新鲜感推动人不由得要写点什么,于是写下了我人生第一篇叫作评论的东西《可贵的心境——读刘亮程散文》。既然这个选刊这么看重刘亮程散文,评论就还是投给它吧!这也就成了《散文选刊》破例首发评论的先河,后来是不是也首发过评论,不得而知,据我所知,之前没有过。不过,因着该刊影响力之故,我和我的评论反而被有些圈内人记住了,觉得不可思议。

接下来的事,应该和大多数文学批评同道们差不多。奇迹没有出现,反复出现的只是阅读的疲惫、写作的艰难和被理论刊物退稿的沮丧。投稿的失败,多少与本人盲目的跟风、不加审视地信奉所谓获奖作品有关。尽管如此,那时候毕竟还发过一些小文章,至少目前来看,那时候在《文艺报》发的还算最多,这在圈内人看来,已经起了不起。是不是真的了不起,我本人最清楚,凭的大概是一种初生牛犊撞橡树的莽劲,根本不是心平气和讲理的结果。直到2005年第1期《南方文坛》刊发《走向绝境的文学批评》(文后作者单位赫然写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回民高级中学”),这在那本刊物中绝无仅有,不但那本刊物,直到今天为止,也绝无仅有),那种莽莽撞撞的气息还大量充斥在字里行间。然而,没想到的是,也许正因为这些,恰好给我带来了转机。2005年2月的某一天,时任宁夏文联秘书长、副巡视员、宁夏作协副主席、宁夏文学艺术基金会干事长、《宁夏文艺家》报总编的余光慧老师突然打电话到家里座机上。先极简短介绍了她自己后,劈头盖脸就一句,你想不想上鲁迅文学院?这个学院我当然听说过,至于是什么人上、怎么上,根本不在我的想象范围。因此,听她这么一问,我是彻底底愣住了,几乎茫然而措地甚至机械呆滞地说,想上。余老师的下一句是,想上就赶紧向学校请假,3月1日就开学了,一个省一个人,宁夏就你了。至于流程,余老师肯定说得很详细,但现在忘了她的具体嘱咐了。记住的是“一个省一个人”,它让我感到格外严肃而严重。下意识条件反射是,我弄的那些个小玩意儿,竟还算个东西!两个月的假,学校里自然不容易请。没办法,只好向余老师求救,她听了我的苦衷,非常理解和同情,只说她想办法。后来我知道,她好像还动了石嘴山市里的一个领导,这领导竟然成了我后来就职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人生太巧了。如此这般,紧赶慢赶,终于搭上了开学前一天驶向北京的最后一列火车。因为时间紧,只买到了一张站票,还是托人搞到的。第二天早上进八里庄已是九点,九点三十分开班仪式就开始了。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金炳华与学员一一握手,到我桌前,他先用右手食指点了点我,微笑着却又是略带批评地质疑我,就是你一路站到北京?我说,是我。我知道他真正惊讶的是,耽误他们研究员组成的人,原来就是这个憨直呆愣的小伙子,好像看不出有什么理论批评气象呀!

当然这中间肯定还有别的故事,一定是余老师告诉了他关于我的一切,不单是报名迟到的事。

至于后来余老师带队,我作为宁夏文学批评作者代表之一,参加过两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对我更是莫大的鼓励和推动。虽然我代表不了宁夏青年文学批评作者,至今都不可代表。然而作为一个微弱的符号,释放出来的信息,却不可小觑,这需要在主席台上经常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张嘴闭嘴致力于地方文学繁荣发展的领导者们细细品品。

鲁院的课以及5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家的无尽交流,当然实实在在开了我的窍,这都是后事了,不说去它。最关键的是,那时我仅仅见过余老师一面,她不见得就记住了我。我何德何能?怎么忽悠悠就上鲁院了呢?这中间亦充满了故事。不过,是宁夏文学领导者与边远基层作者之间的故事。之所以是故事,是因为这在今天绝无可能。也就只有放到像余老师这样心地善良,且眼光一直向下的大作家身上,才那么稀松平常。



牛学智 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出版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双重审视》等10多部,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多项。

结语

以上三位宁夏文学女性前辈,当然都是宁夏、西北乃至全国响当当的作家、编辑家和出版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报告文学领域搅得风生水起的余光慧,因为《鹊雀为邻》《喊叫水》等散文名篇噪一时的冯剑华,以及早

期执教宁夏广播电视台大学,后来成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当时尚未企业化改制)的台柱子,再后来又主持宁夏作协工作且写下无数绵密细微感受的文艺批评文章的哈若蕙,这里我都未谈她们的志业成就。之所以只蜻蜓点水记述了我与她们交往的点滴印象,是因为在我看来,好像真正属于文学应有氛围的那个

时代,正在远去。说严重点,此种远去,恐怕还带有一些程度的不可逆性。正如小文开头所讲,为文学而文学,主要拼的是经费的额度和项目的宏大,以及设施设备的先进,而是人的纯粹和发自骨子里的痴爱。当我们以非文学的任何方式吆喝文学时,收获的一定是虚假和狡辩;当我们以文学的态度敬畏文学

时,哪怕略显寒碜,文学一定是入心入肺的,起码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共情。现在看来,要文学人特别是文学领导者,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这是我在不恰当的时间,按捺不住小小心脏的跳动,非要向我敬重的三位前辈文学女性投去严肃一瞥的真正原因。